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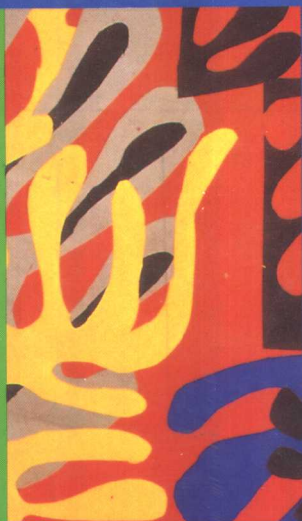
學術著作◆大專用書

中華民國外交 關係之演變

(一九七二~一九九二)

高 朗 著
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



高
朗
著


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
印行

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(一九七二~一九九二)

作者／高 朗
責任編輯／張 玉 蓉



出版者／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

電 話：7055066 (代表號)

傳 真：7066100

劃 撥：0106895-3

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

發行人／楊 榮 川

排 版／正豐電腦排版公司

製 版／申豐實業有限公司

印 刷／強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裝 訂／信成裝訂行

中華民國 83 年 4 月初版一刷

ISBN 957-11-0784-0

基本定價 8 元

(如有缺頁或倒裝，本公司負責換新)

序

這本書是探討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二年間，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變化，研究過程中，彷彿時光倒流，重新走過這段熟悉的歷史，隨著外交局勢的起伏，內心感受極為深刻。

平常聽人說，「弱國無外交」。其實，在國際社會，弱國比強國更須講求外交。近二十餘年來，在中共的打壓下，中華民國外交處境困難，多數國家與中共建交。與我有外交關係的，平均只有二十幾個國家。故一般人提到我國外交時，批評大過讚許。

可是，如果深一層瞭解我們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實際的外交工作時，將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。在這層景象下，我們的外交活動十分積極，外交人員投注巨大的心力，突破中共外交封鎖，在正面外交拓展困難的情形下，我們採取變通方式，重新建立與主要國家的外交聯繫管道。像這些工作都是默默在做，聽不到任何掌聲。所以，評估我國外交時，不能僅以邦交國的多寡，論斷外交的成敗。而應從不同面向探討外交的得失，如



ymt 27/13

此才具有全局的眼光，不會失之公允。

因此，在研究過程中，除使用邦交國指標外，還採用駐外機構、條約、高層官員互訪及參與國際組織等指標，觀察我國對外關係變動的情形。

資料蒐集期間，外交部國際組織司、禮賓司、人事處、檔資處，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曾經提供許多協助，在此表示誠摯謝意。

寫作時，一些師長曾給予我鼓勵與指導，受益匪淺，內心萬分感激。

另外要感謝我的幾位研究助理：昱安、錦文、明璋與永耀，由於他們熱心的參與及細心的校訂資料，才使研究順利進行。

最後，必須感謝我的父母與妻懿慧，寫作中間，我很少陪他們，而他們卻給我愛與溫暖。由於他們全力支持，我才能放心寫作，以一年時間完成此書。

高 朗

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十六日
於關渡

目 錄

序

第一章 緒 論

- 〈一〉 研究動機 / 3
- 〈二〉 研究範圍 / 5
- 〈三〉 研究重要性 / 8
- 〈四〉 研究方法 / 10

第二章 歷史回顧

- 〈一〉 蔣經國執政初期的外交政策 / 19
- 〈二〉 中美斷交與「八一七」公報 / 25
- 〈三〉 外交政策的調整 / 28
- 〈四〉 蔣經國晚年的改革 / 31
- 〈五〉 李登輝總統面對的國際環境 / 34
- 〈六〉 務實外交與大陸政策 / 36

〈七〉 今後外交的方向與挑戰	／ 41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三章 邦交國的變化

〈一〉 分析的層次	／ 53
〈二〉 國際體系的特質	／ 55
〈三〉 邦交國計算方法	／ 62
〈四〉 邦交國變化的總趨勢	／ 70
〈五〉 邦交國在各洲變化情形	／ 76
〈六〉 結 語	／ 92

第四章 駐外單位的變化

〈一〉 駐外單位的政治涵義	／ 101
〈二〉 分析的方法	／ 105
〈三〉 駐外使領館的變化	／ 111
〈四〉 代表處的變化情形	／ 116
〈五〉 代表處稱謂的變化	／ 122
〈六〉 代表處功能名稱的變化	／ 130
〈七〉 駐外單位的層級變化	／ 134
〈八〉 結 語	／ 138

第五章 對外條約關係的變化

- 〈一〉 條約的政治涵義 / 145
- 〈二〉 分析的方法 / 148
- 〈三〉 條約變化的總體趨勢 / 150
- 〈四〉 對外條約的類別變化 / 156
- 〈五〉 與無邦交國家的條約關係 / 162
- 〈六〉 結 語 / 164

第六章 高層官員的互訪

- 〈一〉 高層互訪的意義 / 171
- 〈二〉 高層互訪的計算方法 / 175
- 〈三〉 高層互訪的總體趨勢 / 179
- 〈四〉 高層互訪的地區變化 / 182
- 〈五〉 高層互訪的類別變化 / 188
- 〈六〉 結 語 / 192

第七章 參與國際組織的困境與努力

- 〈一〉 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背景 / 199
- 〈二〉 中共對我參與國際組織的政策 / 207

〈三〉我國加入國際組織的政策	／ 218
〈四〉參與聯合國的問題	／ 227
〈五〉加入國際組織的策略	／ 234
〈六〉結語	／ 236
第八章 結 論	
〈一〉邦交空間日益緊縮問題	／ 248
〈二〉外交關係的地區性差異	／ 251
〈三〉交往國家的類型差別	／ 254
〈四〉蔣經國與李登輝時期外交的區別	／ 258
〈五〉務實外交的成效與挑戰	／ 260
參考書目	／ 265
附 錄	／ 279

〈表目錄〉

表三～一	我與中共歷年邦交國變化趨勢(1972~1992)	／ 58
表三～二	邦交國在中南美洲變化情形(1972~1992)	／ 78
表三～三	邦交國在東亞變化情形(1972~1992)	／ 80
表三～四	邦交國在西亞變化情形(1972~1992)	／ 82
表三～五	邦交國在非洲變化情形(1972~1992)	／ 84
表三～六	邦交國在中東變化情形(1972~1992)	／ 86
表三～七	邦交國在歐洲變化情形(1972~1992)	／ 88
表三～八	邦交國在太平洋島嶼國變化情形(1972~1992)	／ 90
表五～一	我國對外條約地區分佈(1973~1992)	／ 152
表五～二	與我國締約國家分佈概況(1973~1992)	／ 156
表五～三	我國對外條約的類別分析(1973~1992)	／ 158
表六～一	我國官員出國訪問地區分佈表	／ 183
表六～二	外國官員訪華地區分佈表	／ 186
表六～三	我國官員出國訪問類別分析	／ 189
表六～四	外國官員訪華類別分析	／ 190
表七～一	我國加入及退出聯合國專門機構簡表	／ 202
表七～二	目前我擁有會籍或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一覽表	／ 205
表八～一	我國主要貿易國家一覽表(1972~1992)	／ 2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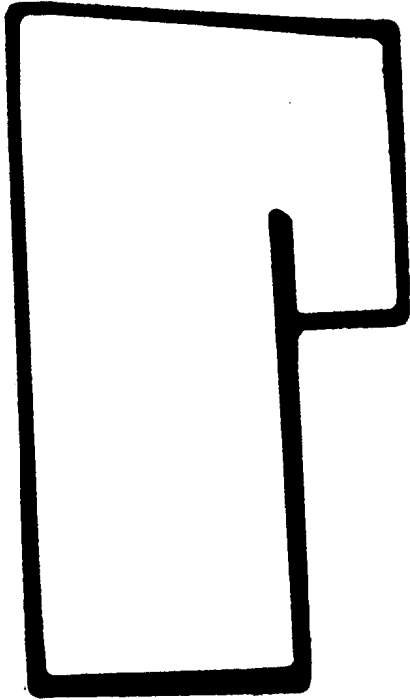


〈圖目錄〉

圖三～一	我與中共邦交國變化趨勢圖(1972~1992)	/ 70
圖四～一	我國使領館變動情形(1972~1992)	/ 112
圖四～二	我國駐外單位與世界國家總數比例變動圖 (1972~1992)	/ 117
圖四～三	代表處稱謂變化圖	/ 124
圖四～四	代表處功能名稱變化圖	/ 133
圖四～五	代表處層級變化圖	/ 135
圖五～一	我國使領館變動情形(1973~1992)	/ 150
圖五～二	我國與締約國外交關係(1973~1992)	/ 163
圖六～一	高層官員互訪變化情形(1973~1992)	/ 179
圖八～一	我與主要貿易伙伴間的外交關係	/ 256

〈附錄目錄〉

〈一〉 我國與全世界國家之邦交情形	／ 280
〈二〉 我國駐外代表處名稱變動一覽表	／ 360
〈三〉 政府其他駐外單位變動一覽表	／ 372
〈四〉 我國駐外單位地區分佈表(1972~1992)	／ 376
〈五〉 我國對外條約分佈情形(1973~1992)	／ 380
〈六〉 我國對外締約國家排名表(1973~1992)	／ 382
〈七〉 我國對外條約類別分析(地區)	／ 384



緒

論

〈一〉 研究動機

此項研究是針對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二年間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演變，所做的總體資料(*aggregate data*)分析。關於蔣中正總統時期（1950—1972）外交關係的變化，在前一本書《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（一九五〇～一九七二）》已經加以說明。此一研究乃是接續前一研究所做的努力，希望將國民政府來台後四十幾年的外交資料，全部連接一起，以進行客觀的比較分析。

在第一階段（蔣中正時期）研究中，曾說明研究的動機起源於：

我國外交的總體資料，竟出乎意料的零碎、不完整。譬如想要知道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二年間，我方邦交國和中共邦交國的逐年起伏變化，竟找不到這樣的數據。更別提在非洲和拉丁美洲，每年彼此競爭下，邦交國變動的數字。這不是說，政府單位未整理過外交資料，而是說政府部門沒有系統性的整理。^①

一個國家如果外交基礎資料未全面建立，無論長期趨勢分

析或短期政策研究，都會因為缺乏確切的數據，而只能臆測或憑印象理解外交的演變過程。對於學術而言，沒有外交基礎資料，不僅無法做更深入的研究，而且等於讓歷史留下一段空白。事實上，此種現象，不僅外交資料如此，其他與政治相關的資料，以往因缺乏觀念，以致長期有系統的資料，不是付諸闕如，就是不夠完整。相對地，經貿資料的整理就顯得科學，其基礎資料的建立，開始的很早，不僅完整而且有條理。

近幾年來，外交部也開始建立外交的統計資料。例如從一九九二年，該部出版「外交統計年報」，其中資料大部分自一九八三年起計算，範圍包括我國對外的主要關係^②。不過，從這份年報也看出，更早的資料，大概年代久遠，外交部已無心重頭做起。雖然如此，發行「外交統計年報」畢竟是好消息，表示外交單位已經肯定基礎資料的重要性。

關於外交問題，以往學界也不太重視基礎資料的蒐集。一方面因為從前研究方向，很少採用量化，比較偏向制度與歷史面向的分析。可是近幾年，受到西方的影響，台灣學界也逐漸重視量化方法。一些研究論文或新書，也時常以量化資料為佐證。不過，這些資料通常有兩項缺點：第一，它們多半是一時片刻的資料，不是長期累積的總體資料，從中無法看出長期趨勢和變化。第二，資料多為官方提供，卻往往沒有經過校訂處理，以致資料的學術價值受到影響。

尤其第二點，學術研究使用官方資料時，必須特別留心。

因為政府單位除了經貿與人口統計，比較符合專業水準外，其他單位建立資料，主要爲了內部參考，或者用作公共宣傳。而負責管理資料的部門，缺乏專業人手，司空見慣；在組織內的地位低，也不受重視。結果導致一些官方數據，並不可靠。使用它們時，無論在準確性、一致性都必須審慎檢驗，否則毫無保留地應用在學術論文，一定會有偏差。

所以，本研究的動機不僅是爲歷史補白，同時也希望校訂一些外交資料，使往後研究者能利用這些比較可靠的總體資料，從事更爲深入的外交研究。

〈二〉 研究範圍

就時間而言，本研究的範圍涵蓋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二年。若從領導人分析，正好跨越蔣經國總統與李登輝總統兩個不同的時代。

如果依照理想，外交總體資料最好一氣呵成，將幾十年來的外交資料全部連接在一起，然後做長期趨勢分析。不過此一理想面臨實踐時，卻遭遇困難。一方面，外交基礎資料的整理，耗時費力，很難短期完成；再則，私人研究限於人力經費，也很難一口氣將幾十年資料一次作出。因此研究之初，就決定分段進行。第一階段時，先針對蔣中正時期的對外關係，予以探

